

# 马公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研讨会纪要

时间:2015年2月5日上午

地点:上海图书馆

主持:戴小京(上海市书协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各位温州、上海的老师、朋友,高老、韩老师。今天举行的马公愚纪念展,按照安排还有一个研讨座谈。开幕式已经都介绍了今天来的主要来宾,为了节省时间,不作一一介绍。座谈研讨现在开始!请韩老师先发言!

韩天衡(上海市书协首席顾问):今天出来感觉外面有点冷,但是进入展馆以后,就感觉到一种特殊温暖。第一个是人气重,第二个是马先生的作品看了以后感到非常温馨。

马公愚先生是我的老师。我1962年就拜公愚老师为师。老师有两类:一类对你的教育是非常严厉,是属于“严父”型的,恨铁不成钢。公愚老师不属于严厉型的那类,他对你的指导帮助,包括对你的批评都是非常温和的,他明显看到你身上、作品有很多毛病,他也是和声和气地跟你讲。这类老师是“慈母”型的,公愚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回忆过去他对我的指导,我就感觉特别安心。老师已经过去多年,一切都成了追忆。

公愚老师在民国时期和对当代的书法还是非常有贡献的。他擅长正草隶篆,对今天书法界的同仁来讲,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极少。公愚先生跟我讲过,60年代海外有一个重要的中国书法展览,外国提出来要找一个正草隶篆都写得非常好的书法家,结果很难找,找来找去还是公愚先生。很多书法家写草书夹杂行书,写大篆夹杂小篆,这就不再纯,真正要纯要有非常强的功力,而公愚先生做到了。马先生曾是英语教师,能会英语,能把中国书法写得那么好的也是非常少。

公愚先生还对我有一种指导。他讲:“写字的时候里面一定要有一两个异体字,甚至于现在已经是死掉了(废止)的字。”因为不懂的人太多,他可以非常不费劲地讲你这个字写得那么差,如果你有一两个字让他读不下去的话,他不识字自然没有资格评论。这是马先生给我传的秘诀,是当时对付社会庸俗之流评论家的办法。1982年西泠印社让我编一部印学论文选,要读大量古人文章和题跋。这时候马先生告诉我的秘诀就起作用了,古人为显示自己学问,里面有那些异体字,这时候大部分我还认识,所以编书解决了很多。那时候西泠印社有一个老同志,他说这些字怎么你认识呢?我说马先生教我的诀窍,我当时把这些奇奇怪怪的字印在脑海里,你们不了解的我了解。我想这些东西回忆起来也是非常温馨的。

马公愚先生的艺术,大家都有定论,不仅是四体皆能,而且画也很好。我觉得他的画好处就是没有习气,现在画家的画,一看就知道他在告诉你“我是画家”。马先生没有明显的职业画家习气,职业本来不是一个坏事,但是过分强调,就是画家习气,反而缺少文气。马先生的篆刻很多人也不知道,他的篆刻也没有习气,很和婉、雍容。我记得“文革”之前篆刻资料很少,马先生自己唯一的那部印谱,就借给我看了三四年,后来才给亦钊兄了。今天那部印谱出来了,很可惜我没盖过章说请我读过。

马先生有一件事情,对于今天的上海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是1940年生的人,解放前小时候出门,总是喜欢看人家店的招牌。当时上海的那些热闹的街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榜书展览会,一到比较繁华的街道,马上就感受到上海文化的特有气息——名家招牌。那些大的招牌都是名家写的,当时热闹的街区,包括南京路、城隍庙,最多的就是马老师的招牌,每一张招牌都写得非常精到、耐看。他写大字,不像现在科技发达,写小的放大几十倍,当时是硬碰硬,大字就是大字写法。但是很可惜,公私合营一合,马老师的招牌去掉一大半,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马老师的招牌就去掉了百分百。我感觉到今天上海招牌文化应该要恢复。看我们现在的那些招牌,什么钢笔体、怪字,甚至中国人招牌不用中国字,用外文,这一点也只有我们中国那么宽容。在我们这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有着深厚中国文化的上海,我认为现在的店招是太差太糟糕。现在也有那么多有成就的书法家,如果书法家的字能够同样来做店招的话,对有文化底蕴的上海来讲,是一种体现文化、体现艺术的表现。希望在座的大记者、媒体也可以呼吁一下,上海应该恢复店招文化。

周志高(上海市书协副主席)书面发言:我先谈跟马公愚老师认识的过程。这封信是马老师1962年3月10日在医院给我的回复,一直保存到现在,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我当时17岁,在上海出版学校美术专科班已经读了两年多了,还没有毕业,我们的学校让我们到单位去,就是朵云轩编辑出版部,一边读书,一边在出版社进行工作实习。我毛遂自荐写了封信给马公愚先生,想拜他为师更好地学书法,我的心得真诚,可能打动了老先生,他给我一个回音,告诉我等他出院之后欢迎到家里来,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作为我的学习时间。后来他出院了,我根据他的手谕上门拜访。开始他看我小青年非常客气,每次借给我一张十六开大的作品,有楷书有行书,借了之后我拿回家临摹。我一般是两个星期左右去马老师家一次,下次来的时候,我就把自己临摹的和原作一并带来,原作还给他,把我临摹的自我感觉惟妙惟肖的拿给他看。他看一个小青年,写书法、临摹,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很高兴。慢慢熟悉了之后,他就让我星期六星期天上午去南京路朵云轩门市部帮忙买墨纸砚,教我给他跑腿说明他还很相信我这个学生。一来一往,就逐步熟悉了。有时候去,他很客气请喝茶,弄些点心给我吃。我只看到老师对我作业口头上的指示,如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具体看到他怎么写。在三个半月的交往当中,马老师逐步对我这个小青年有所了解,很诚实很用功也比较牢靠,于是就有种信任感。有一次他说今天你看我写字(平时

可以说不到一定程度不是特别相信的人,他是不让看的)。那么我就到了他位于二层的书房,书房全是密密麻麻的书柜,线装书很多。我只能看不能动手,规规矩矩的。在靠近南面的大窗子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写字台,他写四尺的、六尺的、甚至八尺的纸都是在这个台子上。他在宣纸上面放两个滑轮,滑轮通过夹子夹着宣纸,然后他开始写,写完了一部分纸面,他一拉绳子,宣纸就像窗帘一样被拉回去,然后继续写。两个滑轮是他自己做的,我在旁边想给他帮忙,他说不用。我就清清楚楚看他从头到尾写首诗。此时此刻,我才体会到入室弟子这个“室”字的含义,在此之前关系虽好,但对书法怎么用笔的、怎么写的,还是隔了一层,他不会让你亲自看到。我后来就想,马老先生很规矩,让我一步一步体会到入室的感觉。看马老师写字真的让我大饱眼福,他的点画、用笔,特别是写草书时,他以真作草,像写楷书那样规矩且笔笔到位。后来他又多次在书房给我指点、修改作品。走到入室这一步的,他就真心教你,没有保留了,不是简单地见了几次面就可以成为入室弟子,他还要考察你的为人,你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进度,然后才能决定。

即使这样可以登堂入室,我还是很难想象能拜马公愚先生为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没有经济收入,去老师家并没有贵重的礼品,也没有红包,最多就是买些水果。马公愚先生觉得这孩子穷,但他勤奋用功,没有学费他照样收。所以我到了为人师的时候,看学生就不是以经济来衡量的。当时马公愚先生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那我这个穷书生不送礼、不送钱肯定就拒之门外了。我1964年毕业后单位的事情多了,去的就不多了,后来就“文化大革命”了,我跟马公愚老师大概学了两年左右。马公愚先生在上海也很有名的学生,比如后来的影响很大的上海书法大家任政先生。马公愚先生不但字写得好,他德高望重,对我们的教导从为人、为艺有双重的意义,我觉得这在今天是值得发扬的。著名的书法家,能够收取穷学生为弟子。这在当今社会里更有启示意义,我认为社会在就业方面应该更多的为农村来的勤奋用功的穷苦学生开辟渠道,因为我当初也是其中一分子。

马公愚先生在上海是很杰出的代表书家。我当时年轻的时候听到,他的招牌是一个字一根小黄鱼,小黄鱼是金条不是鱼(当时一条一两),五个字的招牌就要半斤黄金了,这个价很高了,所以一般人家不敢求马公愚先生写招牌。所以在五十年代上海所有的书法家当中,他的润格是很高的。其实招牌字也不是每个人能写的,马公愚先生的颜字写得厚实、稳重、又灵动,所以他那个招牌字很受市场欢迎。

海派书法发展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几个大家如沈尹默、马公愚、白蕉、潘伯鹰。马公愚在“文革”浩劫中去世,他写的招牌字都被毁,许多史料散失,再加上在书法热潮中一味追求新奇变异,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等原因,对于像马公愚这样传统帖学功底深厚的书家的挖掘和弘扬是很不够的。今天,温州方面,特别是马公愚先生不但字写得好,他德高望重,对我们的教导从为人、为艺有双重的意义,我觉得这在今天是值得发扬的。著名的书法家,能够收取穷学生为弟子。这在当今社会里更有启示意义,我认为社会在就业方面应该更多的为农村来的勤奋用功的穷苦学生开辟渠道,因为我当初也是其中一分子。

马公愚先生诗书画印都是称能,还是海派篆刻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在篆刻领域成就颇丰,只是由于他书法的名声盖过了篆刻。自从他二十世纪步入上海滩后,此地几乎所有的篆刻活动都有他的影子。其中包括1955年成立的上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会,当时马公愚就是副会长,会长是大夏大学推的王福庵,秘书长是张鲁庵。马公愚的篆刻,特别是民国时期早期的一些篆刻作品非常精彩,他出过一本篆刻集子,就是由吴昌硕先生题写的。民国时期大量的名家印谱、出版物的前言和题跋是马公愚写的,如解放前的钱君陶《豫堂印谱》,汪亚尘、江寒汀集子,还有解放后的《鲁迅印谱》。马公愚当时题了大量的印谱、集子,而且写了很多碑文,当时只要写大篇幅的楷书,人们就会找到马公愚。大夏大学在民国时期的四个碑刻都出自于马先生之手,有《思群堂记》《大夏大学十周年纪念碑》《群贤堂记》《大夏大学校舍第一座奠基记》等,从中可以看出马公愚先生扎实的楷书功底,同时他的社会影响也可见一斑。

高式熊(上海市书协顾问):我和马公愚先生住得很近,我从小喜欢马先生的书法篆刻,所以来往也比较多,沟通也多。他有时候晚上过来交谈,一方面教导,一方面谈谈艺术,我受益匪浅。马先生非常温和,非常宽容,非常能讲,有时候在书法方面讲很多道理,所以我现在还深深记住,还在使用。我就讲这一点。

叶子圣(马公愚弟子):我今年98岁,1937年马先生为师,跟他学书法。我稍微谈谈我知道的马公愚先生的一些事情,分两点:一点是马先生的书法。那时候全国公认的书法家四家,其中一家就是马公愚先生。虽然各有特色,但是大家认为马先生的书法最正宗的。上海书法作品选用,当时选登马先生的作品最多。第二点我想谈马先生的人品。马先生对朋友、学生非常器重,马先生与文学家朱自清是非常好的朋友。朱自清先生在温州第十中学当教授,朱自清的家属当年逃难的时候是马先生照顾的,所以朱自清先生对马先生有非常深的感情,特别写信感谢马公愚先生对他的关心与照顾。马先生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情结,1937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汪精卫成立伪政府,邀请马先生出任担任职务,马先生拒绝了,保住了爱国的民族气节。

戴小京(上海市书协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最近一百年来,上海、温州实际上是互相交融很深入。我们在上海有很多杰出的温州人,张淳老师著名的“瓯江三姐妹”,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家。请

她代表上海的温州人讲几句。

张淳(上海市书协副主席):我可以代表双重身份,因为我是出生在温州,但是成长是在上海,所以对上海和温州都是非常有感情的。对于马公愚先生,从小我就非常熟悉他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从事书画方面的专业艺术家。后来我自己从事书画艺术,也看到过他很多的作品,今天在这样一个展厅里面非常全面地看到了他的书法绘画、还有篆刻等真迹。我跟几位上海书法家议论,看了以后觉得非常钦佩。因为这些作品都深深透露出一个艺术家全面功底,包括文学功底,完全是经得起时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一些篆刻是放大来看的,即使放这么大,但是线条还是那么厚实耐看,我们现在青年书画家在功底上及不上,有待于我们再努力的。马公愚先生是温州人的骄傲,也是上海人的骄傲。因为他在后面的成就都是在上海,为海派书法、绘画文化做出了贡献。

方传鑫(马公愚弟子)书面发言:半个世纪前,我有幸叩开马老家的大门,求教于先生。那时先生已七十多岁,我仅20岁不到。在近两年的求知中,有几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影响特别深远,几乎一直贯穿我的学术生涯。起初,先生教我临摹汉代《乙瑛碑》隶书,每次示范三四十字,多次下来已成完整的一篇。笔法、笔势、章法尽在其间。一次在书写“唐”、“育”字时,先生告诫,“唐”字的一点,在隶书中只能写一横,而不能写一点;而“育”字的一点,隶书只能写一点,而不能写一横。接着把“唐”、“育”二字从甲骨、篆、隶字形沿续变迁一一示范。使我认识到,学书法,不仅仅是写好字,还应了解、掌握文字的演变史。一次先生教我临摹《兰亭序》(神龙本),见先生左手捏着纸的左上角,纸上段离桌面约10厘米距离,右手执着双料乌龙水毛笔,书写时纸还在上下轻轻摆动。当时我看一惊,感觉自己悬腕临帖已难度较大,何况纸不着桌面,偌不是亲眼所见,难以置信。先生看到我迷惑的表情,着重示范四种临摹方法。又说神龙本《兰亭序》笔毫毕现,比头发丝还细的纤丝,一支毛笔仅能写一千字左右,毛尖上锋颖经摩擦耗损,就难以达到效果。又一次在先生的写字台上,看到在12寸照像纸上,正反两面浓、淡墨写满全纸,墨迹未干,细辨之下,是临摹怀素自叙帖的墨迹痕,以至照像画面全部掩盖,约有10张左右。据先生所言,都是平时练习所至。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治学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张伟生(上海市书协副主席):马先生我很敬佩。最近我在出版社编了一些东西,比如方介堪先生的全集,今天在展览会也看到马先生为方介堪先生《古玉印汇》写得一张书稿真迹。看了马公愚先生的书法,我感到温州的学者,那些大师们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书法说到底实际上是文化,马公愚先生这么大的成就,书、画、印、文全面修养都非常好,他的艺术当中就透露出他文学涵养。马先生的书法非常恬淡,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搞书法非常急躁,为艺术而艺术。看马公愚先生的作品没有火气,都是很恬淡写自己的心态。我们杂志会在近期把马公愚这位大家推出来。我在整理20世纪海派书法的当中,感觉到从清末民国初,碑系盛行,到沈尹默等在上海举起“二王”的书风,重新回归帖学,他们是一个群体,很有影响的,为上海书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张宪荣(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公愚弟子):在座的都是专业书画的,我的情况不太一样,我同马公愚先生有特殊关系,我是温州人。我母亲是搞书画的,大伯父跟马公愚先生一样也是在大夏大学里做过文学教授,还当过图书馆馆长,我从小一点点大就知道马公愚先生。但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所以我尽管非常愿意跟母亲学画画,但是最后给他们骂了一顿以后,还是进了交大工程。大学毕业分到上海工作,我姨妈马碧笙是温州旅沪诗人,跟马公愚先生关系非常好,她看我喜欢写字,就带我到马公愚先生那里去求学。跟马先生学习使我受益终生。马先生对传承非常重视。书法是一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学书画外,还有要学做人。马先生觉得脱离传统的那种东西不妥,所以我也学了几十年字,基本上都是按照传统的。大家都讲爱国主义,爱国不是爱其他的东西,就是文化,写书法是中国知识分子每一个人都应该干的活。公愚先生写字的时候给我很多启示,比如说写楷书,有时候看你太工整会讲,你不要以为楷书就要很慢,楷书得写快一点,慢了你就滞了。写草书,他说不要看草书龙凤舞就要快,它是一种书体,不是潦草的意思,草书你得适当慢,不是这么很潦草地飘过去,过快了这个字就流了。他在去世前几年,身体很不好,做了一个手术也没做好,甚至肠子还在那里突出来一个包一样,他整天捧着这个包练字。他这样大的年纪不仅每天还临帖摹帖,对传统很敬畏。

高式熊(上海市书协顾问):我和马公愚先生住得很近,我从小喜欢马先生的书法篆刻,所以来往也比较多,沟通也多。他有时候晚上过来交谈,一方面教导,一方面谈谈艺术,我受益匪浅。马先生非常温和,非常宽容,非常能讲,有时候在书法方面讲很多道理,所以我现在还深深记住,还在使用。我就讲这一点。

叶子圣(马公愚弟子):我今年98岁,1937年马先生为师,跟他学书法。我稍微谈谈我知道的马公愚先生的一些事情,分两点:一点是马先生的书法。那时候全国公认的书法家四家,其中一家就是马公愚先生。虽然各有特色,但是大家认为马先生的书法最正宗的。上海书法作品选用,当时选登马先生的作品最多。第二点我想谈马先生的人品。马先生对朋友、学生非常器重,马先生与文学家朱自清是非常好的朋友。朱自清先生在温州第十中学当教授,朱自清的家属当年逃难的时候是马先生照顾的,所以朱自清先生对马先生有非常深的感情,特别写信感谢马公愚先生对他的关心与照顾。马先生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情结,1937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汪精卫成立伪政府,邀请马先生出任担任职务,马先生拒绝了,保住了爱国的民族气节。

戴小京(上海市书协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最近一百年来,上海、温州实际上是互相交融很深入。我们在上海有很多杰出的温州人,张淳老师著名的“瓯江三姐妹”,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家。请

她代表上海的温州人讲几句。

张淳(上海市书协副主席):重病在身去不了,我是双重身份,又是学生又是姨妈的关系,去了他的追悼会。跟他学了那么长的时间,人家说送“束脩”,我连几条干肉都没送过,最后却把他送走了(哽咽)。

戴家妙(浙江省书协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

术学院书法系讲师,书法博士):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参观这个展览。张索老师也布置我一个任务,让我重点思考马公愚先生篆刻方面的成就。马公愚先生的篆刻的意义,我想到两点突围。

第一点突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正是从清代以来流派印几乎到达最高峰的时候,他来到上海。他突围了流派的笼罩,这个价值蛮高的。尤其是上海20、30年代有一批像马公愚先生的人,马先生算代表。“印宗秦汉”这四个字在明代就定格了,但是“印宗秦汉”其实只有“宗汉”,没有“宗秦”。在明代,和“印宗秦汉”这四个字是配套的,是书法当中的“书宗晋唐”。实际上在学术史上应该是“印宗汉”。看了马先生的印以后,他把这个“秦”拿来用了,诏版入印,这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沿着马先生这条路,后面的人走的路还是很深入,但是开了头。吸收了“秦”,这是很大的突围。

第二点,是他和当时同龄人的突围,尤其是跟方介堪先生之间的突围。这两天我也在思考马公愚先生的篆刻,就是他在西泠印社那批人当中,他出过印谱,为什么影响不及沙老,不及西泠印社那一批创始人。可能跟他刻印量少有关系,这是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他成就的东西。但是今天作为后学者,马先生的篆刻给我很大的启示。比如温州这样一批书法篆刻的重要成员,但他们对温州书法篆刻的发展同样影响巨大。解放后方先生就定居温州了,影响温州的篆刻界。马公愚先生也常回家,影响温州书法界。今天的温州书风就是在前辈影响下注重传统,书宗晋唐,印宗秦汉。温州书法也是海派文化的受益者。

第二个问题是当今书坛对马公愚先生缺乏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在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50年代,马公愚先生影响都很大。他的出版物也很多,而且上海的招牌字大多出自于马先生之手。但经过“文革”,马公愚先生写的店招百分之百毁了。“破四旧”时大量作品、书籍,或被烧,或散失,随后在文革中去世。文革结束后,书法复兴,随即而起的是书法观念的变更。创新思潮的泛滥导致了对中国传统书法的片面理解,人们都觉得沈尹默、马公愚是老套、过时了,没有创新没有个性。但今天,我们对书法又有了新的反思,传统帖学又被重新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马公愚先生的展览,意义是巨大的。从这次展览的作品和史料文献,可以看到马公愚先生四体皆能,诗书画印兼擅,综合文化素质极高,不愧为一代书法大家。

陈胜武(温州市书协秘书长):最近20多年以来,我有幸协助马亦钊先生整理马氏家族相关资料,编辑出版了《百里芳人——温州马氏家族300年文史学术资料汇编》,还编纂了《马孟容马公愚昆仲年谱》等重要书籍,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几点深刻体会。

第一,我编辑资料的过程中,我查阅了《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上海百年文化史》《黄宾虹年谱》《王一亭年谱长编》等许多书籍,我深刻体会到,当时马公愚先生和师友的一些重要文化活动,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我对海派文化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我觉得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深入去做。

第二,马公愚先生的定位应该是帖学名家和海派文化的优秀代表。20世纪20到40年代,马公愚与郑曼青、刘景晨、张红薇等温籍画家构成了海上画派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使上海美专成为温州书画人才走向全国的桥梁。建国后到六七十年代,上海书法就是中国书法的高地,马公愚和沈尹默、邓散木、潘伯鹰、白蕉等人,在上海高举“帖学”大旗,崇尚晋唐,力追“二王”。马公愚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极强的书写能力成为“帖学”集群的首要人物之一,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帖学”在式微了三百多年后,重新兴盛了起来。

第三,马先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编年谱的过程中我深刻感觉到这一点,他是性格开朗的人,又接受过新学教育。在1909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当时浙大的学生,在学校里参与了革命的活动。回到温州,也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在上海期间,他是一个热心推动慈善事业的人物。他当时以书画家的身份参与了多个重要的慈善活动,捐献书画作品奉献自己的爱心。此外,他还是温州和上海两地联系非常重要的人员。民国时期,温州在上海有一个“温州旅沪同乡会”,我查了大量史料,他当时在里面也是重要角色,主要处理宣传文化方面的事件。比如1945年12月当时上海的《礼拜六》杂志刊登一篇文章,里面有辱骂温州人的文字,引起温州旅沪同乡会的抗议。在处置的过程中,马先生是宣传文化处的组长,他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理。此外,很有意思的,四十年代以后,他还是证婚人。当时社会上流行婚礼都要请证婚人,因为他懂英语,人也幽默,又是社会名流,大家都喜欢请他。上海当今名家孙慰祖先生的父母,1952年的集体婚礼,就是马先生证婚的。

第四,马公愚先生一家和华东师大的情缘。我查阅资料发现,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为大夏大学,马氏家族里面父子兄弟二代四人是与这个学校有很深的渊源。马公愚1928年8月至1936年3月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文书主任兼教书。他的兄长马孟容曾有作品参与大夏大学建校四周年书画展。他的五弟马素达1931年在上海大夏大学教数学。另外,他的儿子马大任现在定居美国,是一个图书馆专家,曾经在1985年担任过华东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

最后一点,马公愚先生其实是学贯中西的一个人。从小家庭修养成就了他的国学功底,接收过新式西学高等教育,中西文化好的传承在他身上都得到体现,诗、书、画、印都很厉害。我编年谱的时候,发现他的诗也很好,当今是书法家绝大部分是抄书匠,这一块一直以来没有得到我们足够重视和研究。接下来我有兴趣把他留存至今的诗词收集整理为《畔石簃诗选》供大家研究。

金辉(温州著名报人):温州一直深受上海文化的影响,像马公愚先生等温籍名家在上海生活,后来出现了新永嘉画派,其实这种画派对温州影响非常深。以前“文革”的时候,或者更早